



清 乾隆 《御製甘珠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御製甘珠爾》ca函（第五函）。

# 乾隆年間所造藏文泥金寫本

劉國威

## 《御製甘珠爾》之特色

「珠爾」意為翻譯，代表藏文藏經僅收譯作，不收藏人著作；「甘珠爾」指來自釋尊所言的翻譯，所以包括經藏與律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藏傳佛教經典中，清康熙八年清宮寫造《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簡稱《龍藏經》）一向備受矚目，本院十月即將推出的「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將展出以康熙本《龍藏經》為底本翻寫，乾隆三十五年完成的《御製甘珠爾》，本文介紹其版本背景與特色，及與康熙本《龍藏經》的關係。

### 「甘珠爾」與「丹珠爾」之別

從佛教文獻的分類而言，漢文「大藏經」一詞指的是來自印度佛教文獻概念的「三藏」（tri-piṭaka）：經藏（sūtra）、律藏（vinaya）、論藏（abhidharma）；漢文大藏經的架構雖細分為不同部類，但基本上仍是以

經、律、論的次序加以分類編排。西藏人在吐蕃王朝前弘期佛教時期，僅有經錄的編纂，要到西藏佛教復興的後弘期，在約十三世紀初方開始編纂結集藏文藏經，雖然也傳承有來自印度「三藏」的概念，但在經典分類上卻是相當獨特，將之分為「甘珠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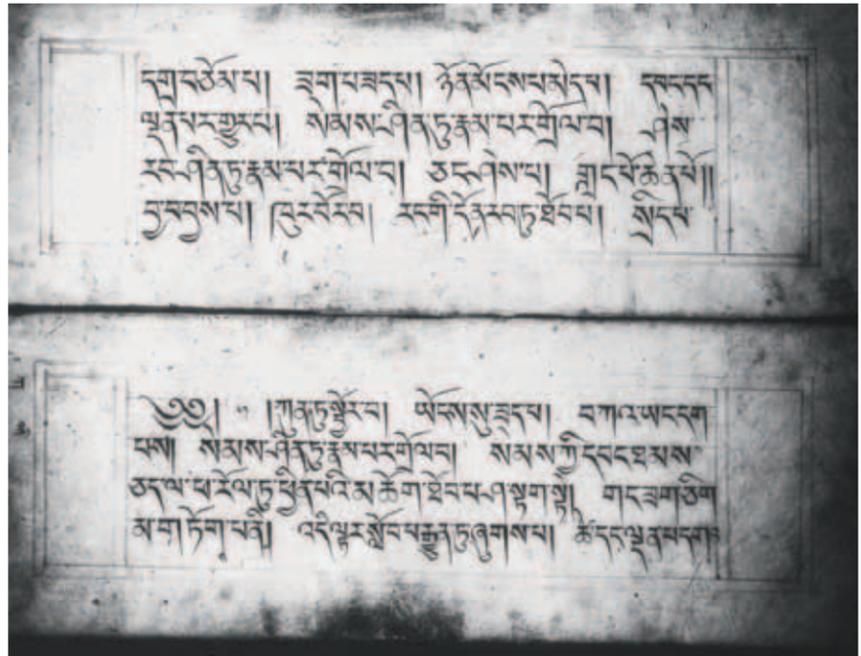
（bka' gyur）與「丹珠爾」（bstan gyur）兩大類：「珠爾」意為翻譯，代表藏文藏經僅收譯作，不收藏人著作（雖仍有少數藏人作品例外收入，但主要仍秉承此原則）。「甘珠爾」指來自釋尊所言的翻譯，所以包括經藏與律藏；「丹珠爾」指佛陀教法的



圖三 卓尼版甘珠爾，1721-1731年由卓尼土司資助刻成。 作者攝

版流傳。  
二、以寫本為主  
藏人雖然自八世紀吐蕃王朝時期即已從唐朝的中國文化習得造紙墨的技術，已經形成以紙張流傳文獻的傳統，但是藏人開始以雕版印刷流傳文獻，則要到十三世紀在元朝蒙古人的資助下始見之，形成後世所謂的「元刻本」(hor bar ma)，但其製作仍限於中原內地，藏人在技術與財力上，當時尚不能負擔此類藏經大部類的雕版印刷，所以初期「甘珠爾」在西藏的流傳，主要是以人工抄寫的寫本 (bris ma) 形式為主，現今藏文各種「甘珠爾」版本的兩大根本本傳本：一三四七—一三五一年於拉薩蔡寺 (tsal) 所編成的「蔡巴本甘珠爾」以及一四三一年於江孜白居寺 (dpal 'khor chos sde) 所編成之「Thems spang ma本甘珠爾」(Thems spang 字意為不傳門外)，均為寫本。明成祖永樂皇帝於一四一〇年自西藏取得一部「蔡巴本甘珠爾」，下令於南京開雕，此為藏文「甘珠爾」經典刻本之始；西藏地區的「甘珠爾」刻

本則始於一六〇八年麗江土司於麗江所開雕之「麗江版」，此版也是依據「蔡巴本甘珠爾」。因此，藏文「甘珠爾」的流傳，早期一直是以寫本方式傳抄(圖一、二)，雕版刻本的流傳大約到十八世紀初的雍正、乾隆年間方成主流，如北京版(一六八三—一七〇〇)、德格版(一七二九—一七三三)、卓尼版(一七二一—一七三一)、納塘版(一七〇〇—一七三〇，中間曾停刻一段時間)等。(圖三)而「丹珠爾」也同樣是先以寫本形式流傳，最早刻本的出現是十八世紀初由清廷下令於北京嵩祝寺勘刻完成的「北京版丹珠爾」：始於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完成於乾隆三年(一七三八)。  
三、多為單一譯本藏文藏經  
一般而言，漢文藏經在遇到同經異譯的狀況時，編纂者會儘量收入不同譯本；藏文藏經雖也有收同經異譯本的情況(例如各版本「甘珠爾」均收有三種譯本之《金光明經》，此為特例)，但多數情況僅收單一譯本。



圖一 普札寫本甘珠爾 (Phug brag Kagyur)，1696-1706年間抄寫於西藏西部普札寺，乃一獨立傳承版本，現藏達拉薩西藏文獻檔案圖書館。 作者翻攝



圖二 出自四川西部之寫本甘珠爾，約完成於十七世紀，現藏西北民族大學。 作者攝

翻譯，也就是後來印度祖師所造經律註釋與相關著作，指的是論藏，這種分類方式至今仍為藏人所使用。而在藏文藏經的流傳歷史上，有三大特點是和漢文藏經相當不同的，以下說

明之。  
一、較重視「甘珠爾」  
雖然「甘珠爾」與「丹珠爾」的分類在編藏早期即已出現，但是在流傳初期，主要重視的是「甘珠爾」，

一方面是對根本佛語的重視，另一方面也是份量相對較少。直到十八世紀成立印經院大量刻版的時期，如北京版、德格版、納塘版等，方見到將「甘珠爾」與「丹珠爾」兩類聯合刻



圖五 清 乾隆 《御製甘珠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御製甘珠爾》ca函（第五函）展件全貌。



圖四 康熙8年（1669）抄寫完成之《龍藏經》甘珠爾，屬蔡巴版傳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乾隆《御製甘珠爾》

從以上對藏文藏經的背景說明，我們可以比較瞭解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康熙八年（一六六九）所完成之《龍藏經》與本文所介紹於乾隆三十五年所完成之《御製甘珠爾》的版本背景。從康熙皇帝為《龍藏經》所造御製序及《秘殿珠林》的記載，此部「甘珠爾」是仿明景泰年間（一四五〇～一四五六）宮廷所藏之藏文泥金寫本《龍藏經》而翻寫（圖四）；如前所述，史料記載明成祖於南京勘刻之「永樂版甘珠爾」是根據自西藏所取得之蔡巴本而來，而永樂版首函所收經錄《善逝寶經廣示日光目錄》（*bde bar gshegs pa'i gsung rab rin po che'i dkar chag bstan pa rgyas pa'i nvi'od*）亦是來自蔡巴本，此經錄亦收於《龍藏經》首函（《御製甘珠爾》首函現存北京故宮，目前無法確認是否仍有收錄），再加上《龍藏經》與《御製甘珠爾》的經部排列皆同於「永樂版」順序，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康熙《龍藏經》與乾隆《御製甘珠爾》皆是依據永樂版，追朔自蔡巴寫本傳承。

寫本傳承。

《御製甘珠爾》的函冊形式除尺寸較《龍藏經》小以外，其他如裝幀等形制大致與《龍藏經》相仿：梵夾函裝，泥金書寫於磁青紙上，經頁居中，上下夾以實心木質經板，以橙色附絲帶經衣包裹後，置入白色哈達，再蓋上比經板尺寸略大的紅色木質朱漆外護經板，再外包棉質經布，以捆經索結實捆紮後，包上厚質被袱，形成一函完整經匣。（圖五）

西藏以泥金書寫於深藍色磁青紙上的傳統甚早，以現存實物而言，一些抄寫於十一世紀初期西藏西部阿里古格地區的大乘經典即是此種形制（圖六）；就史料而言，噶瑪噶舉派第二世巴沃·祖拉臣瓦（2nd dpa' bo gtsug lag phreng ba, 1507-1566）成書於一五六四年的著名佛教史《智者喜宴》（*chos 'byung mkhas pa'i dga'ston*）中，作者收錄三份吐蕃王朝時期的藏王詔書，其中第一份是由贊普赤松德贊（*Khri srong lde brtsan*, 754-796）所頒授，作者說明其形式是「於青紙上以黃金而書寫」（*shog bu thing*



圖七 ca函（第五函）目錄頁，以漢、滿、蒙、藏四體文字書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間取自西藏那部蔡巴本，亦可確證此乾隆三十五年所造藏文泥金寫本《甘珠爾》乃依康熙八年《龍藏經》寫本為準，騰錄而成。經文書寫亦每頁八行，然字體較小，行格較密，無康熙《龍藏經》之仿貝葉穿孔小圓，各函經文首葉以藏、漢、滿三種文體記載中含之經典目錄。（在康熙《龍藏經》中，僅有滿藏文經題，無漢文經題與頁碼）

全帙亦為一百零八函，本院存藏《秘密部》之Ca、Cha、Ja、Nya共四函；《般若部》之Di、Tshi二函；《寶積部》之Vi、Yi二函；《諸經部》之Shu、Su二函；以及《律部》之Te、De二函，共十二函，餘九十六函皆仍藏於北京故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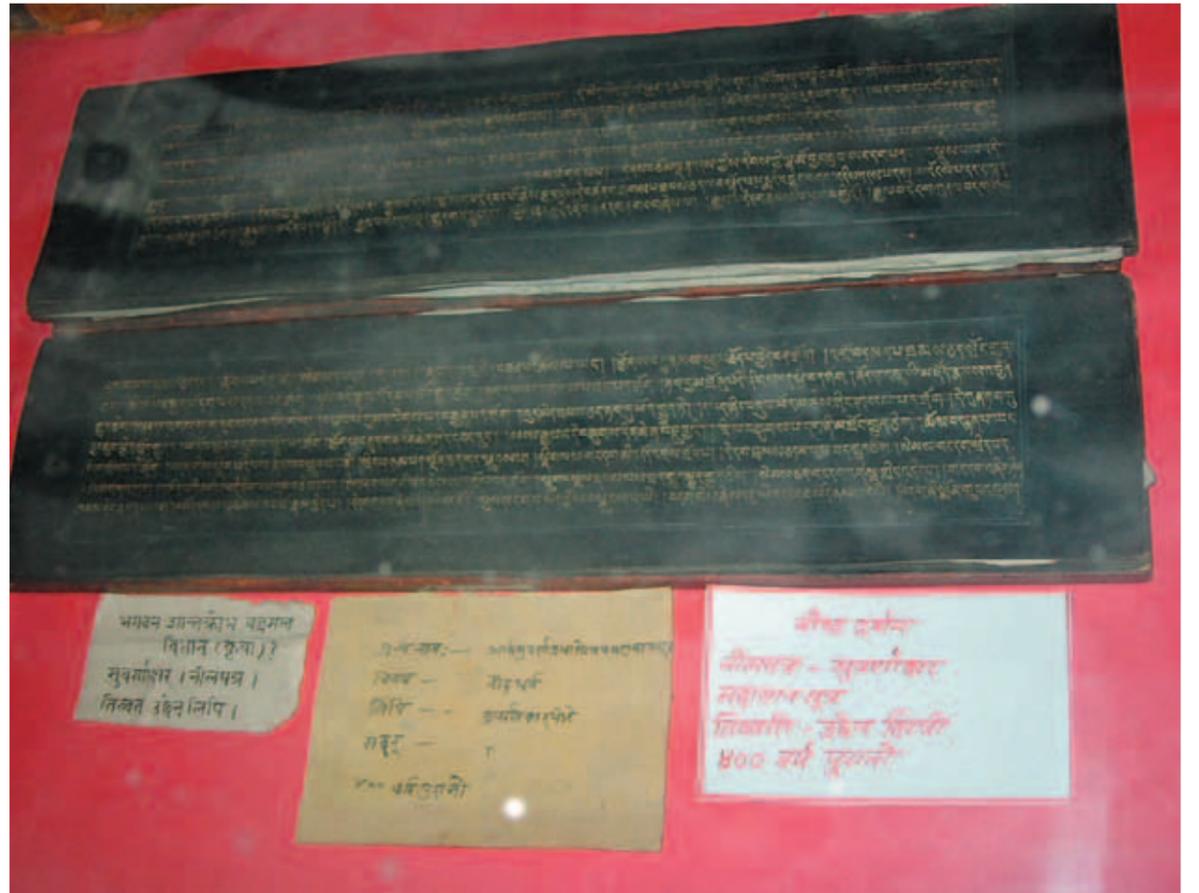
乾隆晚年曾自言：「朕自乾隆八年（一七四三）以後，即誦習蒙古及西番字經典，於今五十餘年，幾于究心討論，深識真詮。」（註一）他對藏傳佛教的深入與投入已有許多各類文物與當代研究可資證明，不待贅言。然乾隆事其生母孝聖憲皇太后向以至孝，逢其壽誕，必大加慶賀，並特別

以佛教形式作功德，如：乾隆十五至十六年（一七五〇～一七五一），逢孝聖憲皇太后六十大壽，於清漪園建大報恩延壽寺，於北海建闡福寺。乾隆二十五至二十六年（一七六〇～一七六一），為慶祝乾隆五十萬壽與孝聖憲皇太后七十大壽，重修弘仁寺與正覺寺；於香山仿雍和宮建寶相寺，其殿中所供文殊菩薩像乃依孝聖憲皇太后默記五台山文殊像所造。

乾隆三十五至三十六年（一七七〇～一七七二），逢乾隆六十萬壽與孝聖憲皇太后八十大壽，乾隆於北海建萬佛樓，供奉萬尊無量壽佛；並仿拉薩布達拉宮，於熱河建普陀宗乘之廟，其中有千佛閣，專門供奉由各蒙古王公貴族所獻無量壽佛；併重修北京黃寺、功德寺；此部《御製甘珠爾》抄寫於乾隆三十五年，應有同為乾隆與其母孝聖憲皇太后祝壽之意。

**《御製甘珠爾》與《龍藏經》**

但此部《御製甘珠爾》雖以康熙《龍藏經》為底本而翻寫，二者仍有此許相異處：



圖六 尼泊爾國家檔案館所藏金字寫本藏文經典，約於十三至十五世紀期間抄寫。 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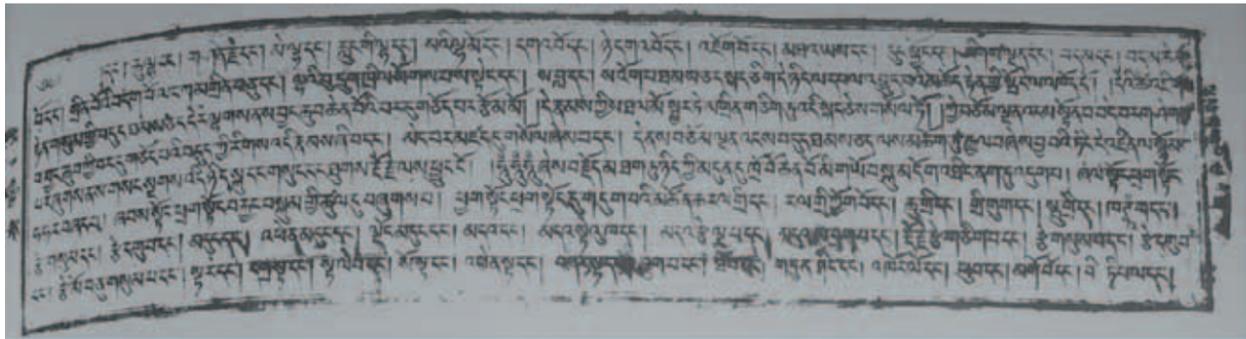
ca la gser kyis bris)。(註一)因此這種書寫傳統在西藏起源甚早，到十三世紀西藏人開始編纂藏經佛典時，此種形式被佛教徒視為極尊崇的書寫供養方式，一般都是由寺院高僧或貴族施主發起，此部《御製甘珠爾》由乾隆皇帝發願令人抄寫也是依循此西藏佛教文化傳統。

其首函有〈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御製甘珠爾大藏經文序〉，序文和目錄均用漢、滿、蒙、藏四體文字書寫。（圖七）每經葉於正頁左方依藏式傳統以藏文為序，右方則以漢文書寫經名及頁碼，體例與北京版刻本同。各函經葉依次疊放，每摺經葉的四側面亦均飾以泥金彩繪八寶圖案。

序文有云：「經字皆西番，頁準貝夾，為卷二千四百五十有七，為函一百有八。相傳明永樂間遣使自西域求歸，景泰間錄度密閣。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康熙八年，祇承重闡懿旨，肩金涓紙載輯，全藏告竣，御製序文冠於簡端。」此段序文證明景泰年間明廷所藏「甘珠爾」即是源於永樂年

二、字體與行數：由於康熙皇帝祖母孝莊太皇太后出身自蒙古族，當時《龍藏經》的抄寫以蒙古與安多地區（甘肅、青海一帶）的喇嘛為主要抄經僧，字體上自然以安多地區流行的藏文書法字體書寫；每函經文首頁僅以滿藏文記載經典目錄，次葉正面自經題起以大字書寫四行，其背頁以較小字體書寫五行，再次葉雙頁面各書寫六行、七行，至第三葉起方以八行份量加以抄寫。乾隆《御製甘珠爾》則在體例上承襲北京版刻本：字體同北京版，較小（圖八）；無仿貝葉之穿孔小圓；各函經文首葉以藏、滿、蒙、漢四種文體記載此函經典目錄，每頁皆八行；頁碼編排形式為每經葉正面左側為藏文頁碼，右側為漢文經題與頁碼。（圖九）

三、就經文內容而言，雖說《御製甘珠爾》是仿製於《龍藏經》，但經典內容的抄寫也同時參校於北京版，這可從部分經典的內容與跋文得到證明。五世達賴喇嘛（一六一七—一六八二）曾命當時一位精通梵文的著名譯師——達譯師阿旺益措倫珠（*dar pa lo sa ba ngag dbang phun tshogs lhun grub*，生於十六世紀末，生卒年不詳）重新編校一套新的「甘珠爾」與「丹珠爾」，其中新收入廓譯師（*Gos Lo tsa ba Gzhonu dpal*, 1392-1481）、慶康譯師（*Khrim Khang Lo tsa ba Bsod nams rgya mtsho*, 1424-1482）以及他自己的譯作（註三），此新編校本成為北京版刻本之所依底本。由於此新編校本的完成是康熙八年以後的事情，所以在北京版與《御製甘珠爾》的部分經典跋文，有廓譯師根據梵文本的再校勘的紀錄，但在《龍藏經》的相關跋文沒有這些紀錄，比方像是《喜金剛密續》（*Hevajra-tantrāja*）與《吉祥勝樂生密續》（*Mahāsamvarodaya-tantrāja*）等，但僅是些微藏文字詞的修訂，並非大的版本差異。



圖八 北京版刻本，ca函（第五函）首頁。 作者攝



圖九 ca函（第五函）內第一頁正面，左方以藏文為序數，右方則以漢文書寫經名及頁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部類函數：雖同為一百零八函，其各部順序亦同於永樂版「甘珠爾」，依序為：《秘密部》、《般若部》、《寶積部》、《華嚴部》、《諸經部》、《律部》。但康熙《龍藏經》之《秘密部》為二十四函、《律部》為十六函；乾隆《御製甘珠爾》之《秘密部》為二十五函、《律部》為十五函。其餘《般若部》、《寶積部》、《華嚴部》、《諸經部》、《律部》則同為二十四函、六函、六函、二十四函。其中《秘密部》的一函差異應當是《御製甘珠爾》依循康熙二十二年至三十九年（一六八三—一七〇〇）之北京版刻本（此版曾於乾隆二年補刻，因於高祝寺雕版，又稱高祝寺版的傳統，添加一函《陀羅尼集》（*gzungs 'dus*）；但關於《律部》少一函的原因，是由於少收律部經典還是合併函冊，因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目前僅有兩函，無法判定，還需進一步研究。

小 結

乾隆朝以後，清宮似未再見此類大部藏文藏經的抄寫，一方面是人力財力所費不貲，不易負擔；另一方面也是十八世紀起各種雕版刻本藏文藏經已廣為流傳，不再以寫本傳抄。此套乾隆《御製甘珠爾》因為分藏兩岸故宮，過去未多研究，仍有不少部分尚待釐清，像是乾隆的國師第三章嘉呼圖克圖（*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 1717-1786）在製作此套《御製甘珠爾》時所扮演的角色，必須由藏文傳記與相關檔案中再進一步探索。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 釋

1. Lokesh Chandra ed. *mKhas-pu'i-dka-h-ston of dPal-bo-gsung-lag*, also known as *Lho-brag-chos-phyu'i*. (Satapiaka Series 9 (4))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1962, p.108b
2. 西藏研究編輯部編輯，《清宮藏藏族史料》第七冊，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頁三五四—九。
3. Sde srid Sangs rgyas rgya mtsho. *Mchod sdong 'dzam gling rgyan gcig*. 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頁四四四。